

# 俄国末代沙皇 尼古拉二世

——维特伯爵的回忆——

(俄) 谢·尤·维特著



新华出版社

#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维特伯爵的回忆——

(俄)谢·尤·维特著

张 开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维特伯爵的回忆**

(俄) 谢·尤·维特著

张 开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昌 平 百 善 印 刷 装 订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875印张 395,000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400

统一书号：3203.021 定价：1.50 元

## 译者的话

本回忆录的作者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伯爵是沙皇俄国末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政治家。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先后担任过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和大臣会议（内阁）主席，后来在革命浪潮冲击下，因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合而被黜。

维特活动的时期，正是俄国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沙皇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维特一方面竭力维护君主独裁统治，另一方面也看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影响到俄国，沙皇政权朝不保夕，因而主张实行某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他的回忆录在这方面反映出不少矛盾的观点。

这部回忆录描绘了沙俄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在内政外交问题上勾心斗角的情景，也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列强角逐的情况。从回忆录中还可以看出沙俄在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方式上两种意见的斗争：一派主张通过履行牧师的职能，另一派主张通过履行刽子手的职能来达到霸权主义目的。这点突出地表现在侵华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之中。

维特回忆录写法上的特点是：并不详述重大事件的本身，而是通过侧面的描写，通过对统治集团各色人物的刻画，通过各种势力对重大事件的态度，以及通过他本人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和感受来衬托当时国际国内的事态发展。

回忆录史料丰富，为研究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历史和国际关系史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

回忆录的原稿分手稿和打字记录稿两个部分，在维特死后由黑森整理成册发表。本书系根据黑森整理后的原文译出。

约瑟夫·弗拉基米罗维奇·黑森（1866—1943年）是德裔俄国资产阶级政论家、法学家、俄国立宪民主党的奠基人和领袖之一。出生于教德萨。1889年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1904年起担任律师。1907年任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曾同巴·尼·米留科夫一道编辑过《人民自由报》（1905年12月），后来又编过《言论报》——立宪民主党机关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流亡国外，1920年起在柏林出版白俄报纸《舵报》，1921年开始编写《俄国革命档案集》。1923年将维特的遗稿整理成回忆录。

1981年12月

## 弁 言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伯爵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卓越国务活动家之一，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货币流通制度实行重大改革，国家预算有了根本转变，从而使俄国得以迅速跻于国际经济交流的平等成员之列，这些变化都同他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复杂的国家经济生活问题上维特伯爵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之所以特别强烈地引人瞩目，是因为他本来是不娴此道的。从所受的教育来说，他是一位数学家，据他本人说，他是通过自学熟悉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原先并没有一个考虑周到的明确计划。在九十年代初<sup>①</sup>他曾坚决拥护农民村社，后来则同样不调和地对此持反对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戈列梅金进行了斗争，以致于宦途中几经坎坷。维特伯爵说过，著名的波斯特尼科夫教授曾经教导他：价格与价值的问题无关紧要，供求理论纯属人们的臆想。他以现实来驳斥人们这种臆想，他说：“‘国家银行主’所需要的东西，首先就是抓住财政情况的能力。”

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维特伯爵死后立即有人围绕他的名字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他的确是一位伟大人物（把他比作彼得大帝）；也有人说，他只是个幸运儿，遇上了伟大的历史事件。

不言而喻，如果我根据同维特伯爵多年私交对他的了解，也兴致勃勃地提出对他的看法，那么这种看法只会给上述争端提供新的原由，因为我的评价也不可能是客观的。要知道，许多人认为他的活动是俄国经历的悲剧的渊藪，但他本人则在回忆录中一再提到：俄国之所以遭到浩劫，是因为他的宏旨没有得到实现。

<sup>①</sup> 指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译注

但是，可以完全客观地确定一个事实：维特伯爵一登上宦途，他那非凡的禀赋就引人瞩目了。不能总是这样认为：不是职位使人发迹，而是人使职位放出光彩。但是对维特伯爵来说情况恰恰如此。他不论担任什么职位，总有出色的成就，到处都留下他那孜孜不倦的活动和首创精神的痕迹。因此，他的历程中没有任何偶然的因素，他稳步上升，迟早总会坐上大臣的交椅。如果将他同另一位大人物斯托雷平比较，那就可以同样客观地对后者作相反的评价。维特伯爵在回忆录中对此人最为反感。斯托雷平在就任大臣之前，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鼠目寸光、庸碌无能的官吏。他全凭别人的庇护青云直上，完全由于偶然的机遇当上了大臣，是在特殊的环境中飞黄腾达的。

虽然维特伯爵的个人品质十分值得称道，不过他遇到的环境也的确十分有利于他施展才能。

众所周知，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期，被公认为是一个实行各项改革，甚至是伟大改革的时期。的确，当时的改革活动已达到了高潮。农奴制曾使俄国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在它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解放农民以及改行推倒这堵高墙的雇佣劳动制，都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生活的整个结构：实行公正的审判，建立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机构。但是，所有这些改革并不是出色的创造性的发端，它们只是铲除了阻挠俄国跨入欧洲大家庭的障碍，为建造各种各样的大厦奠定了基础。与这种情况相适应，亚历山大二世时代涌现了不少驰名的国务活动家。然而，令人注意的是，在他们的传记中，首先突出的总是与他们当时面临的任务相配合的崇高的精神品质，以及在奉行公民平等原则和放弃贵族特权以便扶持“小兄弟”时表现出来的那种侠义的高尚气魄。

基础奠定后，一个反动的时代开始了，不仅是政府的反动，也有社会的反动。不过，建筑什么样的大厦和如何建筑这座大厦的问题，那时已成了当务之急，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俄国应当经过当时已经远远走在前头的西欧所经历的那些经济发展阶段；另一派则认为：鉴于俄国进入世界市场为时已

晚，它将找到自己应走的道路。瓦西里·沃隆佐夫所著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命运》一书是持第二种观点的，在八十年代曾被我们青年学生奉为圣经。但在后来，知识界受到了当时在俄国很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转到了与上述观点相对抗的立场，即倾向于认为俄国的经济发展应当走曾在西欧国家大放光彩的资本主义进化的道路。维特伯爵实际上挑起了解决这一争论的担子，他不是循序渐进地、而是采取了可以说是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了这场争论。

在当时俄国所处的过渡状态中，要解决如此复杂的任务，很难设想有谁比他更为合适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很自然地会认为最恰当的是出现一位正在萌芽中的工业界的代表人物或者商界的闻人。然而这样的念头在当时会被认为是一种褻瀆的想法。我们的官僚制的根子全在于贵族，同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我们以后还可以看到，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对贵族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如果有某个非贵族出身的人居然也要厕身于治理国家的达官显宦之列，那就是不但不可以议论，甚至是无法设想的怪事了。维特伯爵不仅是贵族，而且以出身于贵族之家而自豪。但在另一方面，他那惊人清晰的、思考现实的头脑，他那沸腾的热情，却与他在回忆录中提到的消极蜕化的“输光了的”贵族迥然不同。相反，他曾在铁路上担任工作，他具有愤世嫉俗、与彼得堡的官僚格格不入的思想，他交游颇广，而且结识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一切使他养成了一种合乎情理的“非贵族出身者”的心理，使他有可能与别人相互理解。

可见，维特伯爵一方面是官僚上层完全可以接受的自己人，他们之间可有共同的语言；另一方面，他有种种能力引导俄国沿着时代的总条件威严地推动它去走的那条新路前进。耐人寻味的是，维特伯爵是在1892年，在遭到严重歉收从而十分可悲地表明俄国急需过渡到发展更快的经济形式的时刻就任财政大臣的。

维特伯爵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在实行货币改革的道路上遇到的障碍，因为这些改革无疑是违反地方上贵族的利益的。卢布的



牌价低和卢布在外国交易所中的波动，对那些把粮食卖到国外去的人有利，因为这可以增加竞争能力。维特伯爵通过“贷款”的形式给他们个人一些恩惠，并且让贵族土地银行进行活动，这样就把他们应付过去了，然而这是采取折衷的办法，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对这件事感到遗憾。不过，主要之点在于：要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就要发展老沙皇统治时期已经开始的政治改革，要加强法制，还要实行广泛的社会改革，要推行教育，但这些做法引起了不满。譬如，工厂检查处的设立和活动就遭到了抵制，被认为是国基遭到破坏的根源。维特伯爵说：“工厂检查处”“一直遭到怀疑，这个机构被认为似乎是倾向于支持工人利益而反对资本家利益的”。“我们花了很大气力才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发给因工伤事故致残的工人优待金的法律，而这项法律同国外同类法律相比已经差得多了。”等等。但维特伯爵不得不走这条道路，因此也就获得了名副其实的危险的自由派的声誉，并且越来越激起当权派的怀疑。在希波夫著的那部有趣的回忆录<sup>①</sup>中谈到：当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奏请皇上召开讨论俄国局势的会议时，皇上没有邀请维特伯爵参加，因为他是“共济会会员”<sup>②</sup>。1906年，弗莱德里克斯伯爵以皇上的名义要他不要返回俄国，以免加重混乱。

维特伯爵从这些情况中看到了自己宦途上的悲剧。这部回忆录的主要目的可以说是为了证明自己忠于独裁原则，始终不渝地关心维护君主特权。维特伯爵的全部活动无疑证明了：从他的本性，从他的意向习惯来说，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君主专制主义者。譬如说，恢复金本位货币流通这项主要历史性改革，是不顾国务会议的意见，违反规定的制度实行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指

---

① 见《往事的回忆与思考》沙巴什尼科夫兄弟出版社，莫斯科，1918年。——原注

② 共济会是十八世纪欧洲产生的宗教神秘运动组织，参加者多为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1882年俄国有许多这样的组织被查禁。——译注

责斯托雷平无视根本法的要求。这是他非常典型的性格表现。他灵魂的深处是君主专制主义者，但在同时，正如上面所说那样，又不得不成为自由派，由于他在俄国国家建设方面承担的责任，他成了一个违心的自由派。但是，他同那种认为专制制度不能保障国家建设的稳固性，认为要建设稳固就得有十分明确的政治保障这些思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与此相反，他确信，只要让他担任领导职务，那就根本不存在任何保障问题。当我在1903年同维特伯爵结识时，我同这位政府的代表谈论了立宪问题——这也是时代的要求。但我的设想除了引起困惑以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种困惑鲜明地表现为：我的交谈对方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他说：“我从同他（指同我）的谈话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与此相符的还有一点：1904年12月，根据内务大臣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的要求，起草了一份诏书，要首次宣告召开选举产生的代表会议。这时，从本回忆录中可以看出，特别是从上面提到的希波夫那本书中可以看出，维特伯爵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争取到了在诏书中删掉上述一款。后来，诏书中规定委托他负责进行改革（当时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公爵由于上述一条被删而呈请辞职），这时他深信他能够实现制定的改革计划（维特伯爵说，“我定要将改革付诸实现，决不后退。”）但是，在本回忆录中，他不得不承认，他的信念又成了泡影，12月12日诏书变成一纸空文了。而在后来举行关于召开代表会议的所谓布里根协商时，据维特伯爵本人说，他当时在会上一言未发，甚至过了一年后，对于隆重宣告过渡到立宪制的10月17日宣言，他仍然采取骑墙的态度。他在他的回忆录中自己表示，还力图利用别人的话来证明，他当时无论如何不主张发表这个宣言。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邀请社会贤达参加内阁的设想，由于产生了任命伊·尼·杜尔诺沃为内务大臣的问题而被打消了。杜尔诺沃是维护旧制度的狂热分子。在那以前，亚历山大三世曾有一个关于杜尔诺沃的著名批示：“在二十四小时内把这个混蛋撵走。”而维特伯爵却认为杜尔诺沃的参加比社会贤达的合作更为重要。可是，过了几个

月，在杜马将要召开的前夕，他被迫呈请辞职，其理由是，他不能在杜马面前对杜尔诺沃的做法承担责任。然而命运又把他同这个显眼的人物紧紧地拴在一起，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另一方面，早在当时讨论根本法草案时，据维特伯爵本人说，他的主要使命就是维护君主特权，限制人民代表的权利。这里如果再注意一下：维特伯爵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毫不含糊地指出，革命是早就由“警察—贵族制度”准备好了的，然而在决定性的时刻他又以双手维护了这个制度；那么就无法解一个永恒的历史之谜，换言之，只能听任历史的作弄了。统治上层害怕授予这位不久前好容易摆脱掉的“共济会会员”以宰相的重任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深信，要是迈出如此大胆的一步，就是向社会势力作出极大的让步。但这些势力也不支持维特伯爵，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迫使他公开走上立宪的道路并同过去决裂。而维特伯爵本人，也在回忆录中承认，他的胸中有两个灵魂，它们之间有他的两种政治信念在徘徊。“根据我的家庭传统，根据我的心灵气质，我当然拥戴权力无限的独裁制；但是，根据我所经历的一切，根据我见过和正在看到的上层的种种情况，我的理智引导我得出一个结论：除了规定明智的限制，除了在康庄大道上筑起一堵限制独裁运行的高墙以外，别无出路。”不过，既然权力无限的独裁制的整个悲剧仅仅在于：登上宝座的可能是一个不堪此任的人。所以维特伯爵认为，要是现在亚历山大三世复活，那么俄国就会有救了。可见，他这里的想法其实是：即使是一个不称职的人登上了皇座，只要有一个能干的辅佐，那么权力无限的独裁制就会立即显示出它的神威。因此，在维特伯爵执政时，或者为了他能够执政，他的各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意向自然就重新充分发扬出来了。但是如果说正是历史发展道路上的这个明显的缺陷置维特伯爵于必须引咎的境地，那未必是公正的结论。他在这方面犯了人们通常会犯的 error，而这种 error 发生在大人物身上则会由于笃信个人的作用而很自然地显得更为严重。

正因为如此，也出现了维特伯爵可以告慰的情况：他直到最

后仍然深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在他详尽地回忆包括了如此沸腾的形形色色的国务活动的过程中，他没有一处说到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现的过失，责任全在于别人。前面已经提到：证实这一点，乃是他写回忆录的主要任务。也正因为如此，他很少谈到为他博得了历史声誉、他干得十分出色的那些财政经济改革。在提到恢复金本位货币流通问题时，他主要是谈了改革的表面现象，而丝毫没有反映这项改革当时在社会上掀起的风潮，以及在自由经济界进行的激烈争辩。这些人曾举行的集会吸引了民众，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报刊写了连篇累牍的文章纷纷议论国家预算的改革，而回忆录中只在字里行间提了一下，对于俄德商约的实质也只花了很少的笔墨。可以说他所谈的不是那些不言自明的事件，而是他认为受到压抑，使他无法展翅翱翔的情节。他一再越出自己的职能范围，过问俄国的国际关系，津津有味地历述了他同李鸿章进行的、导致有利于俄国的俄中条约缔结的谈判，叙述了同伊藤侯爵的谈判，谈到了他同远东冒险派进行的、使他失去了财政大臣职位的那场斗争，特别是兴致勃勃地提到了完全由于他发挥了出色的个人才干才得以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但是，他把自己的激情、愤懑以及特殊有力的辩证精神的全部力量都倾注在阐述他自己1905年10月17日的失败上。维特伯爵一方面醉心于贵族—警察制度，另一方面理解到必须实行法治，所以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既归咎于这种制度，又归咎于人民自由派。

因此，在维特伯爵的回忆录中自然也就找不到对他倡议的和参加的那些俄国历史大事的公正的确凿的陈述。

尽管这部回忆录有这些败笔，但也不难通过同别人的回忆录的比较而得到对此的补偿。也许正因为如此，本来也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这部回忆录更显得可贵了，因为作者为这部回忆录涂上的主观主义色彩可以说明统治上层对事物的理解水平和评价能力。

维特伯爵的回忆录几乎一直写到世界大战，这场战争结束时我们发生了革命，革命迄今远未完结。因此，很明显，这部回忆

录包含的很多材料可以说明事件发生悲惨变化的原因，可以回答当代的许多令人忧心忡忡的问题。

维特伯爵是1907年夏天在国外开始写回忆录的。这部回忆录的第一部分包括1903年秋辞去了财政大臣后的巴黎之行，直到缔结了朴次茅斯和约以后回到彼得堡这段时间，维特伯爵为这部分写了如下的序言：

“我生平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写笔记。现在，我已离开了沸腾的政治生活，决定写自己的回忆录。我想，这部回忆录会有助于阐明许多事件。一般说来，我是不喜欢写东西的，所以在国外只好在手边没有资料的情况下勉强地写。如果能在家里继续写的话，是有可能利用找得到的一部分资料的，而现在一切只能凭记忆来写，所以在提到某些日期和名称时可能有些差错。我对某些日期，特别是名字，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对事情和问题实质的阐述，则是完全正确无误的。我写回忆录是断断续续地，想到多少就写多少，而不是坐在那里接连写很长时间，有时写上五分钟，十分钟，就休息一会儿，因此，不仅在文字上没有作什么推敲，有时往往前后不大连贯。

我请求我的后人把它印刷出来，在印刷时，可以在文字上必须润色的地方加以修饰，但不要修改事情的实质。

我的这部分手稿是在布鲁塞尔我女婿这里写的。后面那部分，如果有可能的话，将在俄国继续写下去。不管怎样，我的这部回忆录都将按顺序编号。

维特伯爵

1907年11月5日于布鲁塞尔”

维特伯爵回忆录的后面那部分，即第二部分谈到了10月17日宣言发表的经过，是他1908年1月在彼得堡时写的。

后来就中断了。1908年8月维特伯爵在维希解释他中断的原因时说：

“由于妻子有病和情绪不佳，我很长时间没有去动这部手稿

了，现在我是在无法按部就班地工作下去的环境和精神状态中继续写的，所以下面的和前面的阐述一样，写得匆忙草率。”

但是这次维特伯爵写回忆录的事没有多大进展。1908年11月16日，他在手稿上加了一段如下的注脚：

“我的妻子在伯尔尼作了手术，我无法再写了，现在要回到彼得堡去。不知在那里能否继续往下写。”

回忆录中下面一段注脚标明的日期是1909年7月19日，在维希：

“我停写回忆录已将近一年了。起初是由于妻子有病。后来，11月间回到彼得堡后，一方面由于琐事缠身，另一方面由于不断听到一些谣言，说有人想通过各种途径从我这里捞到一些使人感到不痛快的材料。国外报纸说，有人想抄我的家。不管这多么难以令人置信，但在目前这种尔虞我诈之风盛行时，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况且目前几乎整个俄国或者是形式上，或者是实际上都处在‘非常状态’之中。”

过了一年后，仍然在维希，维特伯爵1910年7月11日又开始继续写回忆录，他说：

“我本来准备在彼得堡继续写这部回忆录，但总感到不甚方便，仍然由于同样的原因无法相信这些材料不会被自由派斯托雷平政府用种种手段搞去。在目前这种‘准’立宪制度中，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

1910年年末至1911年年初这个冬季，维特伯爵仍然未能在彼得堡继续写作。他手稿上注的下一个日期是1911年6月，地点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萨尔茨——施利尔夫。

斯托雷平之死重新燃起了维特伯爵的希望：有可能继续在彼得堡写他的回忆录。他离开比亚利茨时写道：

“今天是1911年11月18日，后天是11月20日，我将离开比亚利茨前往彼得堡。我能在那里继续写我的札记吗？走着瞧……”

他的这次希望又成了泡影。维特伯爵1912年夏天再次出国，着手续写回忆录，他当时注道：

“我已长期没有写了，在彼得堡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动笔。最主要的是因为即使处在象我这样的地位，也很难相信不会有一天突然有人找个什么借口闯进屋来把一切全部拿走。那时就会招来很大的不愉快，而且完全可能是胡搞。可是，如果这样，从此再也不会有人看到我所写的东西了。我现在手头没有我以前写的东西。我结尾时谈的似乎是我任总理大臣期间高级人员变动的情况。现在我将写写在我任期内发生的主要事件的实质。”

同年，维特伯爵在将要写完自己的回忆录时记道：

“我要写完我的回忆录了，如果今后再往下写，页码将从三百六十四页编起（续集），内容将是离现在较近的情节，而这些情节我在速记打字稿中并未提到，因为我曾经认为再往下写已经办不到了。”

1912年10月5日于比亚利茨”

这里提到的“速记打字稿”是维特伯爵回忆录中的一个特殊的部分。

这部分打字稿是他在1910年冬季开始记的。他当时没有可能在彼得堡把他在国外写的那部分继续下去，于是记些政治上比较温和的回忆，时间先后的顺序也略有不同，他一开始就详细描写自己的童年和青年，以及担任公职初期的情况。

后来他对这样做渐渐感到兴趣，于是1911年冬天继续写下去。因此他的叙述便成了一项包括从维特伯爵童年到1911年为止这段时期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重复的工作。维特伯爵在这部分回忆录中只有一段重要的删节：从1905年9月15日到1906年4月底，他说的理由是：

“10月17日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我到4月底为止担任总理大臣的情况，是我以个人的文体写的经历，完全没有作什么修饰，不过我写的东西，不仅循环地阐述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件，而且阐述了在这以前的事件，这部分材料保存在妥善的地点。”

由于在当时我未曾料到以后我要作打字速记叙述，所以在我

写的回忆录的手稿中，后人也可以看到现在我在速记打字稿中谈到的对某些事件的阐述。

这些事件在我的手稿中可能写得更加准确，无疑也会更加坦率，因此，手稿中可能包括速记打字稿中没有包括的事件。

所以，从1905年9月到1906年4月底这段时间的情况我就不再叙述了。”

可见，维特伯爵的回忆录可以分成两个基本部分：他主要是在国外写的那个比较“坦率”的部分，以及他在彼得堡叙述的比较含蓄的部分。

有一个问题比较难以弄清：作为维特伯爵写回忆录的基础的准备工作是怎样做的。不过这方面的有些情况可以谈谈。上面我们已经引用了他为手稿的第一部分写的序言，他写道：他“既无时间，也无兴趣”写回忆录。然而，要使后代正确评价他的作用和意义的愿望，是在他着手写回忆录以前很久就萦绕在脑际的。看来，他出于这种愿望，从自己的政治活动一开始就积累资料，不断搜集各种有用的文件。当他的威信开始动摇时，他开始特别小心地对待这些资料。当时有一个问题使他耿耿于怀：他认为在他有生之年别人没有对他作公正的评价。他希望在他死后会得到这种评价。维特伯爵由于有这样的情绪，所以写道：“当然，我相信，待我入土后，一切都会澄清的，我将会得到应有的评价。人们将忘记我的敌人，但俄国是不会忘记我的。”他搜集材料的主要目的，也就在于使后代更易于利用他有系统地搜集的能说明他个人作用的各种材料来完成这项任务。

除了一般地搜集各种文种的文件以外，维特伯爵还曾主持编纂和有系统地综述某些重大事件。《论1901年前远东政策》这本小册子就属于这种综述之列，警察厅曾根据尼古拉二世的旨意于1904年大肆搜缴此书。

维特伯爵离职后，这种有系统的综述工作仍然在进行。我们甚至了解到他在这项工作中的一名助手的名字。此人就是古里耶



夫，在发现定时炸弹那一天他正好在维特伯爵的家里工作。

我们把他的速记打字稿（对开本十七卷）和在国外写的札记（四开本九卷）都搜集到了。速记稿是打字机打的，札记是手抄的，这两部分稿子都经过维特伯爵亲手修改。

这两卷回忆录涉及的年代限于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其中包括他亲手写的札记的全部以及速记打字稿的三分之二。

维特伯爵本人称他的备忘录“只是草稿”，是“仓促的备忘札记”。他说：“我不记得我以前是否写过这些东西，我手头没有我以前的札记”，“我的叙述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可见，编辑工作的任务就是必须整理维特伯爵所写的材料。整理工作包括：重新编排，分章，删掉重复之处。还纠正了少许文法上的缺陷，不过编辑时考虑到了尽可能保持维特伯爵那种独特的、不太仔细、不太讲究文法的风格。需要重新编排的原因在于维特伯爵当时所处的特殊处境，无论在速记打字稿中还是在札记中，他往往都有不少离题之处。他本人写道：“我没有任何可能按年月顺序来写。”他偶然提到的人物和事件往往使他离开主题，花许多笔墨去专门叙述。正因为如此，出现了大量几乎是逐字逐句的重复。

不过，在重新编排和分章时，原文特有的某些次序紊乱之处仍然保留下来了。这个情况显得特别刺眼是在第二卷开头，谈到他任总理大臣头几个月的情况的那几章中，有些重复之处也保留下来了，因为这是维特伯爵很突出的一个特点。

重复之处通常采取合并编辑的办法，而以札记手稿中比较“坦率”的叙述作为基础。

对重复叙述的某些重大离题之处，以“另一处的提法”的形式作了脚注。

从存疑的角度来看待维特伯爵的回忆录，可以发现速记打字稿同手写札记是大相径庭的。因此，采用札记之处加了※号。读者从引用的“另一处的提法”中可以看到：在比较“坦率的”札记中对人物和事件的估价有了多大变化。